

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三): 以初唐時期為主*

未小妹、姚淇琳
大足石刻研究院

摘 要：本文通過對初唐時期(618-712)千手觀音文本(伽梵達摩譯本、智通譯本、菩提流志譯本)和圖像資料(河北證聖元年造像、龍門石窟萬佛溝第2141號造像、龍門石窟萬佛溝第2137號造像、長安慈恩寺塔尉遲乙僧畫像、菩提流志所見兩京畫像)的梳理，來討論千手觀音信仰初傳漢地之時這些譯本與圖像之間的關係，發現二者之間是先經後像、漢地制像，而後圖像反向影響文本(譯經)，共同推動信仰的傳播。

關鍵詞：千手觀音、圖像、文本、初唐、菩提流志

* 本文為重慶市社科項目2020YBYS202“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階段性成果。

初唐時期(618-712)，是千手觀音文本和圖像弘通、流傳的初始階段，關鍵的三個譯本已經形成，並開始流通弘揚，圖像遺存雖不多，但也為盛唐千手觀音圖像定型奠定了基礎。

一、三個譯本

由《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一）：諸經簡況及辨偽》¹可知：千手觀音漢譯經典主要有智通—菩提流志譯本、伽梵達摩譯本、不空譯本三種，均譯于唐代。智通—菩提流志譯本又可細分為兩種。不空譯本成于天寶五年到大曆六年間(746-771)的長安，不在本文涉及範圍內。

伽梵達摩譯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譯成最早(永徽年間, 650-655)，譯經地點或在于闐，伽梵達摩“來抵中華，有傳譯之心，堅化導之願”²，證聖元年(695)與此譯本直接相關的造像在河北已經出現，景龍三年(709)譯成的菩提流志譯本內容也參照了伽梵達摩譯本，開元十八年(730)此本已“以傳法之士隨緣利見，出經流布更適餘方”³，開元二十二年(734)傳入日本⁴，開元二十七年(739)已經出現在敦煌寫經中。諸譯本中，

¹ 未小妹、姚淇琳《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一）：諸經簡況及辨偽》，收錄於大足石刻研究院編《大足學刊》第四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0年，第255-280頁。

² (北宋)讚寧撰《宋高僧傳》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9-30頁。

³ (唐)智昇撰，富世平點校《開元釋教錄》卷八，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523頁。

⁴ 關於伽梵達摩譯本傳入日本的時間，《大日古文書》可知，天平七年(735)寫“千手千眼經七卷”。更為可信的是養老元年(717)至天平六年(734)隨遣唐使赴唐的玄昉僧正于天平十三年(741)抄寫的《千手千眼陀羅尼經殘卷》(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參照敦煌遺書S.1210，單列字均為17個，殘存內容基本同，玄昉寫本前缺1-299列，後無409-500列(日月光菩薩頌咒擁護、三十藥法等)。故伽梵達摩譯本至遲在天平

伽梵達摩譯本流通最早，流傳最廣，遺存最為豐富，敘事性強、通俗易懂，衍生本和取其內容加以改編的託名偽作亦多。伽梵達摩譯本最早見錄於《開元釋教錄》，未見於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但是綜合證聖元年（695）千手觀音造像的圖像特徵和智昇、讚寧的記載來看，此譯本在武周時期已然“流布餘方”。

智通譯本始譯（貞觀年間，627-649）最早，神功年間（697）集成，譯經地在長安。菩提流志譯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為智通譯本（《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修訂版，譯成于景龍三年（709），譯經地在長安。智通—菩提流志譯本中關於儀軌者有畫像法兩種、曼荼羅法兩種。

從智通譯本波旬制序和經中夾註⁵可知，這個譯本從貞觀年間（627-649）到神功年間（697），由多個梵本片段經多人之手翻譯、組編而成。所涉事件有：

（一）武德年間（618-626），中天竺婆羅門僧瞿多提婆攜圖畫、經本至長安，唐高祖不珍，故未流傳。

（二）貞觀年間（627-649），北天竺僧攜陀羅尼梵本至長安，唐太宗敕長安總持寺僧智通與之共翻，因有漏泄，亦未弘揚。

（三）西來梵僧持經夾給智通。

（四）智通從一僧人處得“印第十八”梵本。

六年（開元二十二年，734）傳入日本。參見《大日本古文書》卷七，第21頁。王頌《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到西元20世紀》（《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39頁。

⁵（唐）智通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中華大藏經》編號308，第19冊，第724頁（《金藏》廣勝寺本）；《大正藏》編號1057，第20冊，第83頁（《高麗藏》本）。前揭未小妹、姚淇琳《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一）：諸經簡況及辨偽》第269-272頁，表2。

（五）智通在原州（一說涼州）從婆羅門僧處得“印第二十二”梵本。

（六）智通從婆伽邊（罽賓國僧闍提于之弟）處得來自北天竺的“印第二十四”梵本。

（七）智通翻出曼荼羅法後，傳于長安弘福寺僧玄暮。

（八）常州正勤寺慧琳從北天竺婆羅門僧酥伽陀（蘇伽施）處得大身（神）咒，與之同至洛陽，由信士李太一翻譯。

（九）神功年間（697），有仁者自京都（長安）至洛陽，攜智通所翻譯本，已成上下兩卷，只缺身（神）咒。慧琳補入，此經具足。

（十）洛陽佛授記寺婆羅門僧達摩戰陀，烏伐那國⁶人，將此經咒和一千臂菩薩畫像進獻給女皇武則天，武則天令人或繡或畫，流布天下。

由此可見，構成智通譯本的梵本是片段式的、獨立存在的，而且各有流傳，智通蒐集、翻譯並傳播了這些片段，慧琳補足了大神咒。在此經翻譯合編成前，即貞觀（627-649）至神功（697）年間，漢譯片段也有單獨流傳的情形的。

二、圖像傳播

波侖制序中提到的達摩戰陀是千手觀音圖像得以四方流布的關鍵人物，關於此事是否可信，先來考證一下二人的具體事蹟。

波侖，活躍于武周時期兩京地區寺院的僧人，從事翻譯，擔任

⁶ 一說為“西北印度烏伐那國(Uadyana, 今之 Swat 地方)”，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編《史岩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208頁；一說為“北印度烏伐那國”，見古正美《武則天的佛王形象》，收錄於韓金科主編《'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頁。

筆受、證義之職。以洛陽福先寺僧身份參與成於天策萬歲元年(695)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的編撰⁷。作為筆受多次參與重大譯經活動，如證聖至長安年間(701-705)實叉難陀於長安清禪寺、洛陽佛授記寺譯經⁸，聖曆三年(700)李無諂於洛陽佛授記寺譯經⁹，長安三年(703)義淨於長安西明寺譯經¹⁰。還為智通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李無諂譯《不空罽索陀羅尼經》制序。

在經錄、僧錄中與波侖有交集的僧人裡，有一梵僧名戰陀，專事譯語，活躍於高宗、武周時期兩京地區的譯經活動中，如于闐僧人提雲般若在永昌元年至天授二年(689-691)於洛陽魏國東寺的譯經¹¹，中印度僧人地婆訶羅在儀鳳年間至垂拱年間(676-688)於長安西太原寺、洛陽東太原寺、長安弘福寺的譯經¹²。

兩人更是同時參與了證聖元年至聖曆元年(695-698)實叉難陀在洛陽大遍空寺、佛授記寺主持的新譯華嚴經一事。《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對此事的記載更為具體，“命藏筆受，複禮綴文，梵僧戰陀、提婆二人譯語。仍詔唐三藏義淨、海東法將圓測、江陵禪師弘景及諸大德神英、法寶而下審覆證義”¹³“複禮綴文；藏公筆授；沙門戰陀、提婆等譯語；僧

⁷ (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第十五，《中華大藏經》編號1150，第54冊，第902頁(《金藏》廣勝寺本)。

⁸ 前揭(唐)智昇撰，富世平點校《開元釋教錄》卷九，第546頁。

⁹ 同上，第548頁。

¹⁰ 同上，第555頁。

¹¹ 同上，第543頁。

¹² 同上，第535-536頁。

¹³ [新羅]崔致遠撰《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編號2054，第50冊，第282頁。

法寶、弘景、波侖、惠儼、去塵等審覆證義”¹⁴。且戰陀參與的三次譯經活動都是奉詔進行，故推測波侖制序中“常每奉制翻譯”的佛授記寺婆羅門僧達摩戰陀應為此戰陀。二僧在初唐兩京譯經活動中有交集，且都從事翻譯，有一定的佛學修養，所以波侖作序中記載的達摩戰陀獻畫一事可信。

文獻材料顯示達摩戰陀有譯經才能，並未提到有圖畫技藝。從進獻的時機來看，他從西方異域而來，到獻畫之時已經在兩京生活多年，如從異域攜像至中土，到都城之初就該進獻。實際上是等到智通譯本合編成功後的神功元年（697），將圖像和經文一起進獻，所以應該是借經文合編完成之機，搜羅了現有的千手觀音圖像進獻給武則天。且此畫像應該與智通譯本有一定關聯。從目前遺存來看，很有可能是與證聖元年千手觀音造像類似的圖像。神功元年（697）因武則天敕令，千手觀音圖像從洛陽開始大規模向四方流布。龍門石窟尚有武周時期千手觀音造像遺存。

值得注意的是，智通譯本雖然合編已成，但是並未敕令與圖像一同弘通，且從現存智通譯本內容來看，仍有疏漏不全之處，《開元釋教錄》亦言其“貝葉交錯，文少失次”¹⁵，這也為景龍三年（709）菩提流志修訂譯本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¹⁴（唐）惠英撰、胡幽貞纂《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大正藏》編號 2074，第 51 冊，第 176 頁。

¹⁵ 前揭（唐）智昇撰、富世平點校《開元釋教錄》卷十二，第 733 頁。

三、五例圖像

在達摩戰陀獻畫之前，河北高碑店（時屬幽州）已有證聖元年千手觀音造像，在此前後，洛陽龍門石窟有千手觀音雕像，長安慈恩寺有千手觀音壁畫。此外菩提流志譯本中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變”應屬圖像記載，而非梵本儀軌。

（一）河北發現的武周證聖元年（695）四月造千手觀音像¹⁶（以下簡稱證聖元年造像）是我國迄今發現的紀年最早的千手觀音像。鑒於在印度也尚未發現千手觀音圖像的案例¹⁷，梵文原典亦不明了，劍橋大學圖書館藏尼泊爾寫本中的千手觀音圖像已經晚至11世紀¹⁸，所以這尊像可以說是世界上迄今發現紀年最早的千手觀音像。

證聖元年造像（圖1-1、圖1-2）又稱“天佑寺佛碑”¹⁹“天佑寺觀音像”²⁰，1986年出土於河北省新城縣（現為高碑店市）南方中村小學，2001年被列入河北省第四批文物保護單位，現暫存於高碑店市新城鎮開善寺²¹。筆者綜合前人記載和實地考察現將基本情況介紹

¹⁶ 劉建華《唐代證聖元年千手千眼大悲菩薩石雕塑像》，收錄於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編《2005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69-476頁。劉建華《河北唐代密教石刻》，收錄於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四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77-499頁。

¹⁷ [日]田中公明著《千手觀音と二十八部衆の謎》，東京：春秋社，2019年，第33頁。

¹⁸ [日]宮治昭《インドの密教系観音と変化観音の源流》，《インド仏教美術史論》，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9年，第522-524頁。

¹⁹ 鄭茂森等主編《高碑店文化集萃之一 高碑店古跡》，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第233-236頁；趙新洪主編《高碑店文化集萃之六 高碑店老街舊事》，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第115-117頁。

²⁰ 張立柱主編《河北省文物保護單位通覽》，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81-182、314頁。

²¹ 2021年7月筆者實地考察時，證聖元年造像暫存於開善寺大殿，後期可能會移入博物館內。考察得到開善寺文管所戎鵬老師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謝。



圖 1-1 河北高碑店天祐寺千手觀音像，武周證聖元年(695) (劉建華老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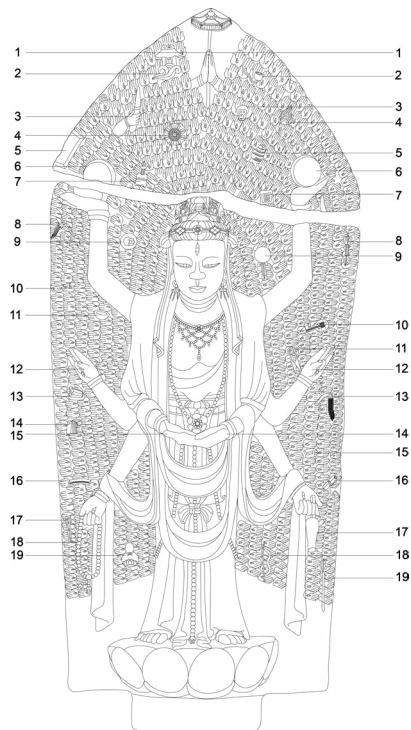


圖 1-2 河北高碑店天祐寺千手觀音線圖 (未小妹繪製)

如下：造像通高 205 釐米，最寬處 96 釐米，材質為白色大理石。背屏式。主像立姿，一面三眼八臂，戴化佛冠，上著袒右式內衣，下著裙，有耳飾、胸飾、瓔珞、腕釧，外披帔帛，跣足，立於仰蓮圓座上。背屏上浮雕諸小手，左半部分均為左手，現存 365 只，右半部分均為右手，計 329 只，加 8 只大手，共計 702 只。造像的持物與手印共有 38 處，從上至下為：左，合掌手（持傘蓋）、碰鈴、骷髏、火焰寶珠、寶螺、日/月（大手）、寶印、金剛杵、寶鏡、琵琶、剪刀、結印（拇指無名指撚餘指伸，大手）、楊柳枝、定印（大手）、斧頭、寶經、寶瓶（大手）、寶弓、寶戟；右，合掌手（持傘蓋）、宮殿、寶劍、金輪、傍牌、月/日（大手）、寶鐸、拂塵、玉環、簫、寶鉢、結印（拇

指無名指撚餘指伸，大手)、寶篋、拍板、定印(大手)、箏(疑)、寶箭、數珠(大手)、澡罐。背屏下方有樺頭。造像配有一青石方形臺座，疑非原件，上有一方形凹槽，為插入造像樺頭用。背屏後有紀年銘文“證聖元年四月八日坊塚村邑眾都維[邊]靜等/天佑寺²²建辦千手千眼大悲/菩薩石像一尊至七月十五日功畢永記/在寺功德主講經律論沙門可[述]/講經沙門可辨持律沙門可[稱][習]論沙門可成習經沙門惠林/[念][經]²³惠芳持課沙門惠目/[常]座沙門惠能等/在村[都]維[邊]靜[邊]進[邊]甯/王□王盛王安/王[千]等□不及具錄/”²⁴。

(二) 龍門石窟萬佛溝第 2141 號東壁千手觀音殘像²⁵(《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新標號為第 5-3 號龕²⁶，圖 2-1²⁷、圖 2-2²⁸)，武周時期(690-705)。龕平面為方形，高 137、寬 160、深 125 釐米。東壁下部起低壇，壁面正中為千手觀音，左右下方各有一圓拱形小龕，龕內均有一半跏趺坐菩薩像。從現存遺跡可以看出，

²² 在王樹楠等纂《民國新城縣誌》卷十五一經幢的記載中提及了天佑寺：“幢在城西北方中村天佑寺，明人崔峨《重修天佑寺碑記》云，天佑寺自金時已有石尊勝幢，蓋亦名招提也”。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誌集成 河北府縣誌輯 37 乾隆直隸易州志 民國新城縣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第 511 頁。

²³ 筆者在識讀拓片時發現前人錄文遺漏“沙門”二字，特補錄之。

²⁴ 前揭劉建華《唐代證聖元年千手千眼大悲菩薩石雕塑像》，第 470-471 頁。

²⁵ 劉景龍、楊超傑著《龍門石窟總錄 第十二卷 文字著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第 57 頁；常青《試論龍門初唐密教雕刻》，收錄於常青《長安與洛陽：五至九世紀兩京佛教藝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 年，下冊，第 623-625 頁。

²⁶ 龍門石窟研究院編著《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壹 文字》，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 年，第 65-66 頁。

²⁷ 圖 2-1 採自龍門石窟研究院編著《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叁 圖版》，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 年，圖版 183。

²⁸ 圖 2-2 採自前揭龍門石窟研究院編著《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壹 文字》，第 66 頁，圖 41。



圖 2-1 龍門石窟萬佛溝第 2141 號東壁千手觀音像，武周時期(690-705)(採自《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叁 圖版》圖版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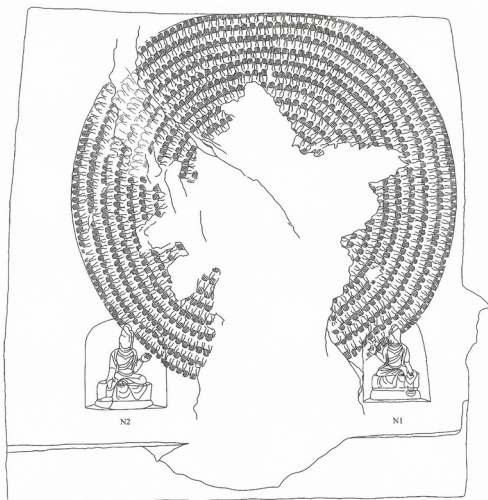


圖 2-2 龍門石窟萬佛溝第 2141 號東壁線圖 (採自《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壹 文字》圖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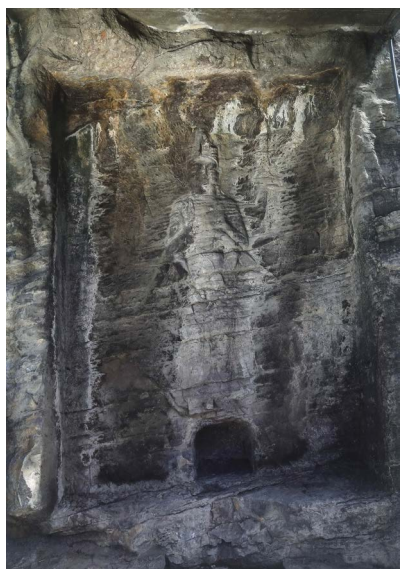


圖 3-1 龍門石窟萬佛溝北崖第 2137 號千手觀音龕，武周時期(690-705) (採自《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叁 圖版》圖版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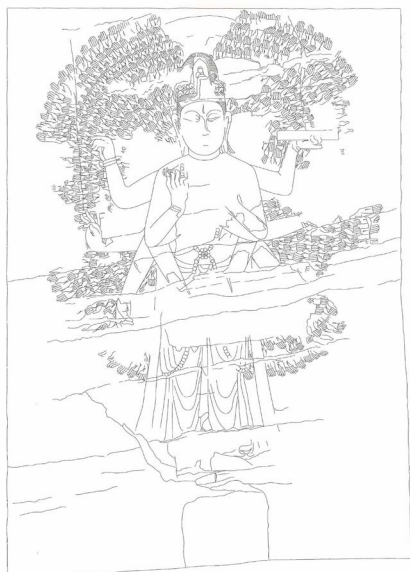


圖 3-2 龍門石窟萬佛溝北崖第 2137 號千手觀音龕線圖 (採自《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貳 實測圖》測 23)

千手觀音像打破低壇，背後小手疊壓二圓拱小龕邊緣。千手觀音高 110 釐米，主體為高浮雕，已被鑿毀，從現存遺跡來看應該為立姿，多臂，身體前有幾臂不詳，但是身體兩側至少有六臂，尚能看出向下方和斜下方伸出的四臂。背後浮雕諸小手，總體呈圓形，直徑 107 釐米，有 4 至 11 圈不等，現存手 768 只，手型在同圈內左右對稱，相鄰圈層左右相異，例如第 1 圈（最外圈）左側為右手、右側為左手，第二圈則是左側為左手、右側為右手，交替排布，整齊有序，沒有疊壓，手心未刻眼睛，眼睛可能採用繪畫的方式。小手上沒有浮雕持物，持物和手印應都在幾只大手上。

（三）龍門石窟萬佛溝北崖第 2137 號千手觀音龕²⁹（《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新標號為第 4 窟³⁰，圖 3-1³¹、圖 3-2³²），武周時期（690-705），龕平面為方形，高 241、寬 175、深 44 釐米。正壁造千手觀音，高 179 釐米，主像高浮雕，立姿，一面三眼十二大臂，高束髮髻，冠有化佛，上身斜披絡腋，下著裙，X 形瓔珞交叉於腹前，交叉處為花朵狀，瓔珞由聯珠組成，帔帛垂於身體兩側。體前有六大臂，左右兩側還有六大臂，共計十二大臂，皆戴腕釧。體前最上方二臂屈肘上舉胸前，右手為食指拇指相撚，餘指伸，應有持物；中部二臂亦屈肘向上，位置略低前者，雙手殘；下方雙臂向下向內伸出，置於腿前。參照唐代其它的千手觀音圖像，此種體前屈

²⁹ 前揭劉景龍、楊超傑著《龍門石窟總錄 第十二卷 文字著錄》，第 56 頁。前揭常青《試論龍門初唐密教雕刻》，第 625-626 頁。

³⁰ 前揭龍門石窟研究院編著《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壹 文字》，第 46-48 頁。

³¹ 圖 3-1 採自前揭龍門石窟研究院編著《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叁 圖版》，圖版 118。

³² 圖 3-2 採自龍門石窟研究院編著《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 貳 實測圖》，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 年，測 23。



圖4 莫高窟第148窟千手觀音主體綫圖，四十二大臂，大曆十一年(776)
(未小妹據《敦煌石窟全集 10 密教畫卷》圖 26-27 摹繪)

肘的食指拇指攥、餘指伸的雙手多為手持蓮花，如莫高窟第148窟（圖4³³），此龕千手觀音尚能看到從右手中伸出的蓮莖³⁴，中部二臂

³³ 未小妹摹繪自彭金章主編《敦煌石窟全集 10 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1-52頁，圖26-27。

³⁴ 劉景龍主編《龍門石窟造像全集 第10卷》，北京：文物出版社，第82頁，圖219。

雙手應為合掌狀。身體兩側最上方者屈肘上舉，呈直角狀，左手托一方形物，疑為寶篋；中部二臂平伸向外，右手結印，拇指小指撚，余指屈；下方二臂斜下方伸出，右手似持念珠。身後淺浮雕多層小手，呈放射狀向四周伸展，總體呈橢圓狀，共 8-10 圈，現存手 760 只，小手排布基本有序，手型亦是在同圈內左右對稱，相鄰圈層左右相異，但不如第 2141 號整齊，尤其是靠近軀體的不規則空間中排布略顯凌亂，掌心各刻一眼。

（四）長安年間³⁵（701-705）尉遲乙僧在長安慈恩寺塔繪製千手觀音，這是畫史上最早的案例。《唐朝名畫錄》載“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間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狀，不可名焉。……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³⁶。《宣和畫譜》亦言“然衣冠物像，略無中都儀形”³⁷，御府藏其“大悲像一”。雖未見到真跡，從文字記載也可看出，尉遲乙僧的這種異域風格濃郁的千手觀音圖像顯然與時間上相距不遠的、“完全本土化的並符合初唐造像風格的”證聖元年造像大不同。風格雖不同，具體圖像樣式是否相似卻不明了。

（五）菩提流志受武則天之邀，從武周長壽二年（693）至中宗神龍二年（706）駐洛陽佛授記寺譯經。神龍二年又隨中宗至長安，於崇福寺譯經，一直到開元十二年（724）再次隨駕入洛。³⁸可以看到菩

³⁵ 慈恩寺大雁塔建於永徽三年（652），長安（701-705）中更拆改造，推測晚唐時人所見尉遲乙僧壁畫為長安年間繪製。見金維諾《閣立本與尉遲乙僧》，《文物》1960 年第 4 期，第 61-69 頁。

³⁶（唐）朱景玄撰《唐朝名畫錄》，收錄於吳玉貴等主編《四庫全書精品文存 29》，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 年，第 305 頁。

³⁷（宋）宣和年間官修《宣和畫譜》卷二，收錄於吳玉貴等主編《四庫全書精品文存 29》，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 年，第 322 頁。

³⁸ 前揭（唐）智昇撰，富世平點校《開元釋教錄》卷九，第 561-568 頁。

提流志長期活動於兩京地區，所以流存於兩京地區的武周時期的千手觀音文本和圖像，他均有機會看到。

從《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一）：諸經簡況及辨偽》³⁹《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二）：四十手法與諸天鬼神》⁴⁰可知：菩提流志譯本修訂了智通譯本，尤其是在圖像儀軌方面，曼荼羅法上也更為詳盡繁瑣。智通譯本和菩提流志譯中的千手觀音畫像法，均有一面三眼千臂千眼、一面三眼二臂兩種。兩本關於第二種畫法的記載相同，亦明言出自梵本。不同的是第一種畫法，菩提流志刪去了智通譯本第一種畫法前的“謹案梵本”字樣，對第一種畫法進行了增飾，稱其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變”，即一面三眼十八大臂九百八十二小手的千手觀音圖像。

若畫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變者……是菩薩身作閻浮檀金色，面有三眼，臂有千手，於千手掌各有一眼。首戴寶冠，冠有化佛。其正大手有十八臂，先以二手當心合掌。一手把金剛杵，一手把三戟叉。一手把梵夾，一手執寶印。一手把錫杖，一手掌寶珠。一手把寶輪，一手把開敷蓮花。一手把繯索，一手把楊枝。一手把數珠，一手把澡罐。一手施出甘露，一手施出種種寶雨，施之無畏。又以二手當臍右押左仰掌。其餘九百八十二手，皆於手中各執種種器仗等印。或單結手印，皆各不同，如《心經》說。

³⁹ 前揭末小妹、姚淇琳《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一）：諸經簡況及辨偽》，第256頁。

⁴⁰ 末小妹、王春《千手觀音文本與圖像關係探討（二）：四十手法與諸天鬼神》，收錄於大足石刻研究院編《大足學刊》第五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1年，第114-133頁。

手腕一一各著環釧，身服著以天妙寶衣，咽垂瓔珞。⁴¹

雖然其中十八大臂有 15 處手印、持物與伽梵達摩譯本同，但名稱略異（表 1）。12 處與證聖元年造像同，尤其是不見於伽梵達摩譯本的“當臍右押左仰掌二手”，見於證聖元年造像腹前交疊二手，即定印手。持蓮花手在龍門石窟千手觀音像上也可見到。所以此種千手觀音畫法雖與伽梵達摩譯本關係密切，但更直接的來源應該是已經存在的武周時期的千手觀音圖像。換而言之，菩提流志譯本中的畫像法記述了並非出自梵本的，而是他所見的、頭戴化佛冠、主體十八大臂、背後諸小手持物結印、千手各有一眼的千手觀音圖像。

菩提流志譯本還明確了寶冠的樣式——化佛冠，這在伽梵達摩譯本也未曾出現，但是在證聖元年造像和武周時期龍門石窟第 2137 號千手觀音像都可以看到冠中化佛。化佛冠可能是千手觀音繼承了淨土系觀音的圖像特徵，而且伽梵達摩譯本中也提到過千手觀音本師為“阿彌陀佛”。

⁴¹（唐）菩提流志《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中華大藏經》編號 310，第 19 冊，第 763 頁（《高麗藏》本）；《大正藏》編號 1058，第 20 冊，第 101 頁（《高麗藏》本）。

表 1 伽梵達摩譯本、證聖元年造像、菩提流志譯本手印持物比對

序號	伽梵達摩譯本 四十二個手印和持物	證聖元年造像 三十八個手印和持物	菩提流志譯本 十八大手手印和持物
1	如意珠手	火焰寶珠	寶珠
2	絹索手		絹索
3	寶鉢手	寶鉢	
4	寶劍手	寶劍	
5	跋折羅手		
6	金剛杵手	金剛杵	金剛杵
7	施無畏手		施無畏
8	日精摩手	日	
9	月精摩手	月	
10	寶弓手	寶弓	
11	寶箭手	寶箭	
12	楊柳枝手	楊柳枝	楊枝
13	白拂手	拂塵	
14	胡瓶手	寶瓶	
15	傍牌手	傍牌	
16	鉞斧手	斧頭	
17	玉環手	玉環	
18	白蓮花手		開敷蓮花
19	青蓮花手		

20	寶鏡手	寶鏡	
21	紫蓮花手		
22	寶篋手	寶篋	
23	五色雲手		
24	君持手	澡罐	澡罐
25	紅蓮花手		
26	寶戟手	寶戟	三叉戟
27	寶螺手	寶螺	
28	骷髏杖手	骷髏	
29	數珠手	數珠	數珠
30	寶鐸手	寶鐸	
31	寶印手	寶印	寶印
32	俱屍鐵鉤手		
33	錫杖手		錫杖
34	合掌手（左右）	合掌手（左右）	合掌手（左右）
35	化佛手		
36	化宮殿手	宮殿	
37	寶經手	寶經	梵夾
38	不退金輪手	金輪	寶輪
39	頂上化佛手（左右）		
40	蒲桃手		

41		定印（左右）	當臍右押左仰掌 （左右）
42		拇指無名指撚餘指 伸（左右）	
43		碰鈴	
44		琵琶	
45		剪刀	
46		簫	
47		拍板	
48		箏（疑）	
49			甘露

四、圖文關係

縱觀初唐的千手觀音圖像名號，證聖元年造像自銘“千手千眼大悲菩薩”、尉遲乙僧繪“千手眼大悲”、菩提流志記“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三者均最合伽梵達摩譯本，尤其是前二者對千手觀音“大悲”屬性的強調。五個圖像案例在形式上始終強調“千手千眼”，亦是出自伽梵達摩譯本中觀世音菩薩發願後所現“千手千眼”神通之相，即“我時心歡喜，即發誓言，若我當來堪能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者，令我即時身生千手千眼具足，發是願已，應時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證聖元年造像 38 處手印與持物中有 28 處與伽梵達摩譯本合，菩提流志譯本 18 處手印與持物有 15 處與伽梵達摩譯本同。在大臂數量上，諸像從八臂到十二臂，再到十八臂，最

後到盛唐的四十二臂定型，逐步向伽梵達摩譯本的四十手法（實為42個手印、持物）靠攏。伽梵達摩譯本是千手觀音漢譯諸經中對圖像影響最大的，是漢地千手觀音圖像依據之本。其影響是逐步實現的，首先是名稱，其次是千手千眼和四十手法，即觀音本體圖像特徵，再次是眷屬（或稱法會參加者）。即便是手印和持物，也是逐步向其靠攏的，圖像在初始階段並非完全按照文本記載鑿繪，可能是因為伽梵達摩譯本中並未明確表示四十手法是圖畫之法，還是修行之法。

由前文已知，在諸像出現前已有的文本除了伽梵達摩譯本，還有智通譯本的片段。證聖元年造像、龍門石窟第2137號千手觀音、菩提流志記千手觀音像額部均有一眼，此特徵並未在伽梵達摩譯本中見到記載，在沒有找到其它圖像序列來源的情況下，極有可能是源自智通譯本中“面有三眼”的畫像法片段的單獨流傳。智通譯本的畫像法中也再次強調了千手觀音“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的圖像特徵。智通譯本片段是初唐千手觀音圖像的次要參照文本。

菩提流志在修訂智通譯本時，除了增補遺漏、調整段落語序外，還把並非出自梵本的、他所見的、頭戴化佛冠、主體十八大臂、背後諸小手持物結印、千手各有一眼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改寫進畫像法中，也是罕見的圖像反向影響文本的案例。

五、結論

千手觀音信仰在漢地的傳播，自西而來，始自初唐，可信的時間可以具體到高宗、武周時期，呈現出先經後像、漢地工匠參照經文和既有圖式創造圖像的特點。

初唐千手觀音文本和圖像的流通中，雖然統治階層的意願在此

過程中很重要，但是在武則天敕令流通前，伽梵達摩譯本、智通譯本片段已經在民間流傳，並創造出了一面三眼、戴化佛冠、主體多臂、背後諸小手的千手觀音圖像。

早期的文本和圖像又經達摩戰陀之手進獻給武則天，才開啟了千手觀音圖像從上至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大規模傳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圖像發展一方面繼續向經文儀軌靠攏，一方面又吸取既有的圖式因素，逐步走向成熟。

同時，因信仰的流行，對已有的文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成了菩提流志對智通譯本的修訂，圖像的力量反射到新的文本中。文本和圖像互相影響，共同推動信仰的傳播。